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誕生於抗戰烽火中的《義勇軍進行曲》，每一次唱響都讓人潮澎湃——

神聖旋律

■楊奎

激蕩靈魂的聲音 經典抗戰歌曲回眸

《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安眠在山清水秀的“彩雲之南”。

滇池之濱，西山山間，聶耳靜靜地坐在參天古樹環抱中。墓園正前方，立著一座白玉聶耳雕像。他身披風衣，雙眉微皺，彷彿又在構思新的作品。凝視墓碑上“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9個大字，我的耳邊似乎又回响起那激昂旋律。

聶耳，1912年2月出生於昆明。成長在被列強欺凌的舊中國，目睹山河破碎和人民痛苦，他決心用音樂作為武器喚醒社會覺醒。他的音樂夢想，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走進墓旁的聶耳紀念館，一把小提琴日晷吸引了我的目光。棕漆斑駁，面

板微裂，琴頸有些磨損，但依然能看出琴的品質不俗。據聶耳日記記載，這是1931年，他在上海買的二手小提琴。講解員介紹，聶耳在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用的正是這把小提琴。

1932年，聶耳與田漢在上海相識。田漢回憶：“聶耳是一個有音樂才能的青年，更難得的他是一個愛國者。”於是，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合作了《前進歌》《畢業歌》等佳作。在那個黑暗年代，這些作品如同劃破夜空的閃電，照亮了人們奮勇戰鬥的路。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田漢埋頭創作抗日救亡電影《風雲兒女》，但剛寫出故事梗概就不幸被捕。接續創作的夏衍來找導演

師毅，正好遇到聶耳。聶耳強烈要求：“聽說《風雲兒女》的結尾有一個主題歌？作曲交給我，我干。”沒等夏衍開口，聶耳就緊緊握住他的手，又重複了一遍：“我干！交給我。”最後，聶耳還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拿到歌詞，聶耳如獲至寶，满怀激情地開始了創作。他幾乎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在桌子上打拍子，一會兒坐在鋼琴前彈琴，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唱起來……

在作曲過程中，聶耳根據旋律特點，把原詞末尾改為“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的聲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說，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不畏強暴，無懼犧牲，為挽救民族危亡，前進，前進！這幾個音符看似簡單，卻正表達了抗戰軍民的心聲。在後續修改中，聶耳又將“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中國民族”改為“中華

民族”。一字之改，意義升華。

田漢和聶耳兩位偉大的藝術家，以筆為刀，以曲為號，譜寫了永恆的經典。自《風雲兒女》公映後，《義勇軍進行曲》迅速流傳開來，奏响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強音。

新生的進行曲，如一條大河冲破冰封的嚴寒，如滾滾春雷打破山河的寧靜。

“抗戰以來，文藝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只有音樂，普遍於全體民眾，像血液周流於全身一樣。”文化名家丰子愷在《談抗戰歌曲》中寫道：“在沿途各地逗留時，抗戰歌曲不絕於耳。連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來，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說，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跟丰子愷的記述相呼應的，是著名記者愛波斯坦的回憶。1938年，台儿庄大捷，他目睹中國官兵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冒着日軍炮火沖鋒的情景，深受

震撼。他寫道：“這首激動人心的歌曲，使舉國奮起，众志成城……”

《義勇軍進行曲》還突破國界，被更多人唱響。在緬甸，中國遠征軍先頭部隊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軍歌，士兵們在訓練和作戰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氣。馬來西亞的一支抗日游擊隊將其改編為戰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義勇軍進行曲》被選入反法西斯盟軍凱旋的曲目。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10月1日，開國大典，《義勇軍進行曲》那雄壯的旋律，在天安門廣場响起。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是每個中華兒女心中的神聖旋律。無論戰爭年代抑或和平時期，無論山高水遠抑或順暢坦途，無論在何時何地唱起，它總能震撼人心，總會帶來力量。這便是歷久彌新的藝術經典，這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

《義勇軍進行曲》手稿、萬里長城、抗日救亡運動和田漢寫下的祭國詩……細細瀏覽聶耳墓後那氣勢磅礴的大型浮雕牆，一幕幕畫面，撞擊著心靈。聶耳墓園，形如月琴。墓前依次擺著七個隱喻音階的7個環形花環。秋風簌簌，攪動叢林樹葉沙沙作響。告別紅燄之際，我再次回眸，只見墓前五星紅旗高高飄揚，紅得醒目耀眼。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我耳畔响起，天地間，彷彿正有金色的音符在跳動……

歲月長歌

烽火回聲

■寧明

五女山岩石的骨縫里
還殘存著1931年冬天的那場雪
山谷里的槍聲，將雪花抖落
這些脈絡分明的潔白花瓣
隨風飄進北溟湖的懷抱
讓每一朵浪花的心情格外激動
仿佛盼到前來增援的親人

關門山紅透的楓葉不會忘記
那支高舉抗日大旗的隊伍
唱著義勇軍進行曲
轉戰白山黑水間
播下抗擊侵略者的救亡種子
讓那些被子彈啃破樹皮的天女木蘭
在春天，不再恐懼滲出殷紅的血漿

強壓著怒火的煤層在地下呼喚
將軍那柄已沉眠多年的馬刀
決不能在輕音樂里沉睡
它曾砍碎敵人“圍剿”的如意算盤
激勵抗聯營里的篝火永不熄滅
讓岩壁上鏤刻的口號和信念
在每一場秋雨中，挾著怒嘯的山風
發出“不做亡國奴”的吶喊

這裡的每條河每座山，都能記住
當年他們結識過的英雄名字
甚至連筆架山下的那塊大青石
都願意以英雄的名字命名
摩天嶺上的霧靄里，殺聲漸遠
一行記憶的腳印正在生長青苔
那一場西征軍歸來途中的殲滅戰
讓墜落的松針都屏住了呼吸

太子河從不沉默
它把每一聲吶喊都釀成浪花
那些沉入河底的彈片和子彈壳
如今已化作游動的星光
在每一個月圓之夜
裝扮兩岸新栽種的火樹銀花——
那是人們用烈士墓前的野草根系
嫁接出的又一代和平之花

有一種回聲一直在山谷間傳響
像鋼鐵淬火的聲音，決絕而雄壯
但爐口里跳動的不再是戰火
而是楓葉熔成的霞色
當孩子們在抗戰遺址前放下雛菊
山風會把松濤調成麥克風
讓每一塊岩石都開口說話——

看啊，當年我們用血肉守住的陣地
正在托舉起飛馳高軌的軌道
那些凍僵在雪堆里的握槍手掌
已化作漫山紅透的杜鵑
在勝利日的第八十年輪里
點燃起一個東方大國的嶄新黎明

★ 文藝戰士抗戰親歷

戰火中誕生成長

■東江縱隊東江流動劇團導演
林榆

東江流動劇團（以下簡稱“東流劇團”）是東江縱隊的一支戲劇隊伍。一開始，劇團是由縱隊部分愛好戲劇的青年組成的，演出形式很簡單，在街頭和廣場把軍毯圍起便開演了。演出沒有完整劇本，多是把活生生的現實材料編成活報，以揭露敵人罪行、反映軍民殺敵的英勇故事為題材。那時，東江縱隊這支人民的武裝隊伍不僅受到敵偽圍攻，還有來自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威脅，隊伍處在敵、偽、頑三面夾攻的環境下，戲劇採取這樣最輕便的形式配合戰鬥是非常必要的。

東流劇團的同志們，不僅從事戲劇工作，而且要揹起槍來和戰士一起參加戰鬥。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下，他們隨同隊伍日間隱蔽，夜間行軍，相當長一段時間，只能在山間密林里搞文娛活動。後來隊伍擴大，東莞、宝安若干地區已建立起民主政權，局面打開，東流劇團才有舞台演出。這時他們除了演出活報外，演出的劇本有《打倒日本仔》《有槍出槍》《模範之家》《老模標》《盲啞恨》《生面人》和多幕劇《流寇隊長》等。這些是劇團經常演出的保留劇目，而且流行於整個東江解放區，為各地的部隊、學校、政府和民眾團體所採用。

當時的藝術工作者，既是一個政工人員，又是一個游擊隊戰士。在軍事情況緊張的時候，他們分散到連隊和戰士們一起參加戰鬥，在戰鬥中鼓舞士氣，或做其他戰地動員工作；在戰鬥結束以後，又馬上集中起來，開晚會，或立即掛幕演戲。他們的工作是永遠受到戰士們歡迎的。劇團每到一個地方，無論群眾或部隊都會馬上活躍起來。兒童團圍著他們，婦女會拉去了女同志，農抗會的父老和他們談心，大家像老朋友一樣，無拘無束。

在部隊中，因為劇團的到來顯得更熱鬧了：教新歌、開晚會，講八路軍英雄的故事。他們經常到前線去，在距離敵人五六里的地方演出。東莞的政工隊有一次在客家山工作，敵人突然進寨。當劇團接到情報，剛離開那地方，敵人的騎兵就到了。在戰鬥的環境里，劇團常常是過著戰鬥生活，一晚換幾個宿營地，或接連幾日行軍；行軍中做戰士的鼓動工作，休息的時候開台演戲。在敵人進攻粵北那年，東江縱隊部分隊伍挺進粵北敵後，去牽制敵人。隊伍連日戰鬥行軍，戰士疲倦不堪，那時又必須爬過一個大山，演劇隊的同志就走到他們前頭，向他們鼓勵說：“同志們快爬，到了山上我們演戲呀！”

東江解放區的人民戲劇運動就是這樣在黨的領導下，在戰鬥中誕生、鍛煉和成長起來的。

（標題為編者加，摘編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



★ 畫外音

這幅油畫創作於2009年，屬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由中國美術館收藏，入選“人民必勝——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美術作品展”。著名畫家、該畫作者全山石認為：歷史畫家需兼具史學思維與藝術表達能力。在創作該畫時，全山石覺得畫面應體現《義勇軍進行曲》所代表的中華民族精神。他以歌詞中的“血肉”“長城”“起來”等為靈感，提炼出“血肉長城”這一關鍵視覺意象，採用史詩般的紀念碑式風格，描繪中國近代史上悲壯的一頁。

（楊澤宇）

義勇軍進行曲（油畫）
全山石、翁誕亮作

★ 走近抗戰英雄

坡屋頂，白牆壁……走進位於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孝順鎮新項村的一棟民居，一面寫著“雷焯烈士故居”的金色牌匾高懸在正廳門楣上。自從2020年8月1日開放後，許多人來到這裡，了解雷焯烈士的生平事跡。

雷焯，原名項俊文，曾用名雷雨、雷華。

他是典與祖宅投身抗日的英雄，是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中唯一一名攝影記者。1938年，雷焯離開家鄉，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24歲的他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督察冀組組長，兼任新華社督察冀分社和《晉察冀日報》特派記者。1943年在反“掃蕩”戰鬥中，雷焯犧牲於河北平山，年僅29歲。

作為《金華日報》記者的我曾輾轉河北多地，尋找雷焯戰鬥過的印記。汽車在河北北西的公路上蜿蜒前行。漫山遍野的板栗樹，郁郁蔥蔥。很快，我們就到了潘家口水庫。薄霧輕籠中，我們行舟深河古道。兩側群峰矗立，險要天成，喜峰口古長城依勢蜿蜒。

喜峰口，是萬里長城眾多關隘中的一個。這裡“北抵烟沙通塞北，東連山海接遼東”，是名關險隘。明代時，戚繼光鎮守薊州，修建、鎮守古長城；80多年前，八路軍將士在此抗擊日寇。

喜峰口，也是雷焯生前戰鬥的重要一站。雷焯拍攝的《在長城喜峰口向日敵陣地射擊》等作品，反映了冀東人民子弟兵馳騁遼河、挺進熱南、轉戰古長城內外的實況，被中國攝影界視為抗戰前線的攝影佳作。

“1942年，端午節戰鬥中，子弟兵在喜峰口附近向敵人陣地射擊。”雷焯拍攝的照片中，遠處是在山巒中蜿蜒的長城，近處是伏在山嶺上的戰士，他們長陣以待，手搭扳機，槍口指向前方。另一張照片中，戰士們行走在山道上，背對鏡頭，堅定頑強的形象躍然眼前。

昔日烽煙散盡，眼下的喜峰口，沒有了當年雄關要隘的險峻。20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修建潘家口水庫，喜峰口關口低洼處長城被庫區水淹沒，形成了一道獨特風景——水下長城。古長城沿山脊盤旋，一頭扎入水中，又從對岸一躍而上，如游龍過江。在喜峰口長城，我登高望遠，那戰火硝煙的場面彷彿浮現在眼前。

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喜峰口的戰鬥必然艱難。而雷焯就是衝著“難”來，要

登臨險峰的最高處。他寫道：“我中華民族這一柄復仇復土之劍，必將愈磨愈利，直指黑水白山，直指日寇心脈！”愈是艱難險阻，愈是信念不移。以雷焯為代表的紅色新聞人，在一場場戰鬥中奉獻青春熱血，頑強不屈。

除了喜峰口，我還經常回想起冀東山中的那片綠色與血色。

潘家峪，位於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東北部，群山環抱，盛產葡萄。走進村中，映人眼簾的便是那家院院落里藤相連、蔓相接如蔭如蓋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村民悠閒地喝著茶、嘮著嗑。讓人難以想象，80多年前，這裡是一片焦土，濃煙里蹣跚著火舌，硝煙和血腥味弥漫著整個山川。

潘家峪是抗戰期間著名的紅色堡壘村，日軍幾次“清剿”都未能得逞，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941年1月25日，農曆臘月廿八，村裡人忙著準備過年。“沒想到，鬼子們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威逼著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進院，點燃柴草，向人群開槍，頓時火光沖天，血流成河……”去採訪時，有村民這樣

跟我們描述。當年，駐豐潤千名日偽軍，瘋狂屠殺無辜群眾1230人，燒毀房屋1300多間，致使29戶人家被絕，製造了駭人听闻的潘家峪慘案。

大風在怒吼，蒼天在哭訴。慘案發生次日，雷焯趕到潘家峪，成為第一位報道慘案的記者。“一進院門，眼前盡是人尸，惡腥的氣味迎面撲來。”1942年，雷焯泣血之作《冀東潘家峪的大慘案》在《晉察冀日報》發表；1943年，他拍攝的慘案照片在《晉察冀畫報》公之於世。

“哀嚎以外，聽不見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聲和老人的咳嗽，沒有炊煙也沒有燈光……昏昏里，在潘家峪，向誰告辭呢？”雷焯未發表的《慘案現場視察記》，用紀實文學的形式，寫下了他在潘家峪看到的慘案現場。鮮血、泪水與呼喊，匯入了歷史長河。

我們追尋，我們聆聽，我們思考。在潘家峪，一波又一波遊客前來，望向潘家峪慘案紀念館旁高高聳立、寓意“警鐘長鳴”的鐘塔。這裡的鐘聲，在每年潘家峪慘案紀念日都會準時响

起，警示人們銘記歷史、珍惜和平、開創未來。紀念館一側，我看到潘家峪慘案紀念館講解員正與潘家峪希望小學的學生交流。經過培訓，這些孩子將成為紀念館的志願講解員。

紅日照遍了東方，歷史的真相也正由一代又一代人繼續講述下去。希望之火熊熊不熄，紅色種子薪火相傳。

下圖：杭州市武林廣場“抗戰英烈”雕塑群中的雷焯雕塑。



學術支持：褚銀
版式设计：方漢、楊磊、賈國梁